

目 录

第 一 章	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概况	(1)
第 一 节	历史上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概况	(1)
第 二 节	建国以来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发展概况	(18)
第 三 节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现状	(24)
第 二 章	人口系统分析模型简介	(49)
第 三 章	黄土高原地区综合分区人口发展的中长期预测	(53)
第 四 章	黄土高原地区综合分区劳力需求及人才发展预测	(67)
第 五 章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分析和预测	(79)
第 六 章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合理容量	(88)
第 一 节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合理容量(可能—满意度法)	(88)
第 二 节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合理容量的系统动力学模拟分析	(97)
附录 1	人口发展中长期预测方法和技术简介	(106)
附录 2	劳动力需求和人才发展预测的方法和技术简介	(110)
附录 3	可能—满意度方法介绍和系统动力学模拟的流程及其符号说明	(112)
附录 4	《黄土高原地区综合治理开发考察系列研究》成果目录	(121)

第一章 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概况

黄土高原地区地处黄河中游，东起太行山，西至青海湖，南抵秦岭，北到内蒙河套阴山一带。在行政上，包括山西、宁夏两省（区），内蒙的河套地区，陕西的陕北和关中，河南的洛阳、三门峡地区，甘肃的陇东、陇中和青海的海东区。共计289个县市，土地面积为64.2万平方公里。1985年末本地区人数8139.22万人。本地区除少数的陡峭石山外，绝大多数地区为黄土冲积物所覆盖，土层深厚，土质肥沃，土地资源丰富的条件。

自古以来，黄土高原就是中华民族的聚居之地，享有“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文化发祥地”的美称。并且历来还是少数民族聚居和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有36个民族栖息和生活在这一地区。他们不仅交汇相融，生息繁殖，而且对黄土高原地区进行了辛勤的开拓，创造了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他们为开发祖国这块富饶的土地，共同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状况，是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发展形成的，本地区的历史人口的兴衰起落，无不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由于历史久远，在多民族长期杂居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这就为本地区历史人口活动过程增添了更加纷繁的图景，所以只能大概地描述本地区人口发展的历史画卷。

第一节 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人口概况

一、黄土高原地区的古代历史人口状况

（一）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繁衍地区之一，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早在五六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劳动、生活的足迹。据现有的资料，1964年在本区出土的“蓝田猿人”比“北京人”更具有原始特征，已能打制简单粗笨的石器，以狩猎和采集为主，属旧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家还在晋、豫交界的黄河两岸，芮城县西侯度和陕县张家湾等地区都发现过旧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这类遗址在陕西境内多达30多处。

距今约20万年，人类进入到智人阶段，如在本地区出土的大荔人、丁村人、河套人是早期智人古文化的主要代表，其遗址分布在陕西的大荔，山西的襄汾、阳高及朔县，内蒙的河套等地。由于人们增强了应付自然环境的能力，并且逐步地从同一群体内的群婚过渡到族外群婚，他们在人的生育和物质生产两个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由于生活条件艰苦，死亡率高达60—80%^①，人的寿命平均只有十几岁。总之，在本地区内，从蓝田猿人、大荔人、

① 《见人口研究》1985年第6期。

丁村人、大窑人到河套人，一脉相承，连绵不断，他们与北京人、山顶洞人共同构成了人类进化史的活教材，建立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早、最远古的历史档案。

到了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制度确立，人类经济生活有了重大变化，由渔猎采集转为以农牧为主，由穴居野外进化到建房聚居而组成的村落，婚姻制度由族外群婚向对偶婚配转变建立家庭，人类改造自然的本领增强。70年代以来，在本地区陆续发现距今约七至八千年的内蒙红山、河南新郑裴李岗等约40多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新石器中期的遗址早在1921年在渑池县仰韶村首次发现，后来又在关中平原，汾河下游、晋南和豫西北，青海省海东区和甘肃东部的黄河两岸等地陆续发现了同一类的遗址——仰韶文化遗址，其中以西安半坡遗址最为“典型”。

“半坡人”距今约6000年，使用多种打磨精细的石器骨器，制作了有很高实用和艺术价值的彩陶器具。据资料分析，“半坡人”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母系氏族。由于生产的发展，生活条件的稍微改善，群体人口增加到四五百人，人的平均寿命增至30~40岁，最高可达40岁^①。

继2千多年的仰韶文化之后，以薄胎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继起。这时，石器和陶器更为精致，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有较发达的畜牧业，处于父系氏族公社晚期向奴隶社会过渡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在甘肃、宁夏、内蒙等黄土高原各地，出现了著名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马家窑文化”和“细石器文化”，其中“齐家文化”类似“龙山文化”。这些错综分布的文化遗址，揭示了几千年前人类祖先在这片土地上顽强生活的情景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古代文明。

（二）先秦时期的黄土高原地区历史开始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

从公元前二十二、一世纪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大约16个世纪的奴隶社会时期，先后建有夏、商、周三个王朝。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我国政治、经济以及人口的主要分布区，始终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夏人主要活动于目前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带。据《帝王世纪》的材料，夏初全国总人口为1355万人^②，这是我国现有的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人口数字。

西周时“迁移农业”逐渐变为“定耕”。由于政局较稳，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因而西周的人口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其时，全国总人口已达1371万人^③。

周平王时，周室东迁洛邑，王室贵族和庶民百姓大都随往，并把周的农业技术和文化传播到中原大地。与此同时，甘肃的秦人乘机向东进入陕西，羌人的祖先徙居黄河沿岸的洮河、大夏河、渭河上游等地，与北方的匈奴和东边和华夏诸侯有了密切联系，内蒙河套阴山一带已有鬼方、工方和东湖活动。这不仅是中国古代人口的首次移动，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另外，黄土高原地区还是我国进行人口调查最早的地区。据《史记·周本记》记载，在周宣王39年（公元前789年），为补充兵力财物，乃料民于太原（即统计人口），这是记入史册的国家直接调查户口之始。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大变动时期。各国为了富国强兵，争霸中原，普遍对人口开始重视，大力鼓励人口增殖。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着意东进，实行了将所

^①见《中国人口-陕西分册》第二章。

^{②③}资料来源于《人口研究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辑。

属人口按五家一“伍”为单位编制起来的“户籍相伍户籍制”^①。这项户籍的实行，旨在强化对劳动人口的监管，便于征兵征赋。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变法，人口政策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推行“垦令”和“徕民令”，以免租役等优待条件奖励开荒，吸收三晋人口入秦定居。他再次编造户籍，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民户不得迁徙，并实行按户口征赋。各国鼓励人口增殖的结果，使战国时期人口发展速度超过前代。据史学家们估计，当时全国人口约有2000万^②，本地区这时人口估计可达850万^③，并稠密地聚居在黄河中游一带，平均密度最高可达每平方公里30~40人左右。由于“土地狭小而民众”（《史记·货殖列传》），兴起许多“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如“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即马弩手）十万”，可见人口之多。由于战乱频繁，加之生产力水平低下，在先秦以前的二千多年中，本地区的人口始终没有突破900万。

（三）秦、汉、隋、唐的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概况

秦、汉至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发育成熟以至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黄土高原区在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都处在重要地位。随着人口迁移流动和各民族互相广泛交汇融合，奠定了本地区经济文化、习俗的基础；奠定了各民族交融的基本格局，这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和人口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1. 秦、汉时期的黄土高原地区人口状况。

秦统一六国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开发和巩固疆土，秦王朝曾组织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大距离的人口迁移。如“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并征40万人修筑长城，派30万人北击匈奴，这些具有“屯垦戍边”性质的大规模移民，使原先开发程度较低的陇东、内蒙古河套、宁夏等黄土高原的边远地区的人口有了明显的增加。仅甘肃陇东在秦代人口就达35万人之多。与此同时，秦始皇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什伍制，又令百姓自报私有田地入籍，由此强化了户口管理。

国家的统一、封建制的确立，本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开辟了前景。但秦始皇却实行了“臣蓄天下”的政策，以骇人听闻的规模滥用民力，仅修骊山陵墓就役使70万人。在苛政暴敛之下，每年被征的服役者不下300万，极其繁重的劳役使广大人民“死者不可胜数”，四处流亡，结果人口并没增加反而大量耗损。

这一时期，由于大规模人口迁移和军事性人口的大流动，形成了本地区历史上一次较大的人口波动。

西汉初，社会经过战乱，“民亡盖藏”，“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面对人口散亡，经济凋敝的残破局面，汉王朝实行了轻徭薄赋、招抚流亡、强制早婚、释放奴婢等一系列措施，使经济和人口得以恢复和发展，随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由于国力的增强，汉武帝时多次大规模出师北击匈奴，在夺取之地实行军民屯田制度，以开辟新的耕种区来配合军事行动，并大兴农田水利。与此同时，西汉还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元朔2年（公元前127年），西汉曾向内蒙、河套“募民徙朔方十万人”，元狩4年

①见《中国人口-陕西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章。

②见范文澜《中国历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见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④见《中国人口-内蒙古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章。

(公元前119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朔方以南新秦中70余万人”。由此推断,河套地区在当时人口不会少于几十万。此外,早在西汉初年,青海河湟地区正式纳入我国郡县体系,汉族人口纷纷移入,并大力发展农耕,打破了原居羌民以牧为主的传统经营,这就保证了人口相对的稳定性。这种“屯戍”和“移民实边”政策的实行,是黄土高原地区的一次时间长、规模大的迁移活动。这不仅加强了汉王朝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而且使这些地区经济得以较快的发展,为人口自然增殖创造了条件。到平帝元始2年(公元2年),整个黄土高原地区人口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128万人(见表1—1),形成本地区的第一次人口高峰,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5767万)的19%。

由表1—1知,当时全区人口户均为4.44人,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15.4人。但各地人口分布极不平衡,人口最多的司隶郡(今河南、陕西等黄土高原区),人口达668万;次为并

表1—1 前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黄土高原地区各州郡人口数分布表①

州郡名	户数	口数	每户平均口数	人口密度(人/km ²)
司隶	1519857	6682602	4.40	42.5
并州	450432	1926879	4.28	11.8
朔方	313733	1673450	5.33	9.1
凉州	259990	1001838	3.85	4.4
合计	2544012	11284766	4.44	15.4

州(今山西一带),人口为193万;最少的是凉州(今甘、青地区),仅为100万。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司隶郡,平均每平方公里42.5人;次为并州,平均11.8人/平方公里;凉州最低,仅4.4人/平方公里。

这些资料是历史上最早的正式的人口记录,反映了本地区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即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由东向西逐步减少,人口分布中心位于黄河中游两岸地区,它形成了我国最早的大面积人口稠密区。

汉武帝时,黄土高原地区的关中地区就曾有较好的种植业基础。但由于本地区是政治、经济及人口分布中心,粮食耗量大,地小人众,当地供应不足,因此采取从山东调运粮食的措施。昭帝时,每年漕运粮食400万斛,使卒达6万之众。由于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到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大批农民沦为奴婢,加之公卿守相贪残无度,天灾频繁,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导致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内战连绵不断,使得北方的并、凉、朔方诸州在战争中受到极其惨重的破坏,所谓“千里无烟,无鸡犬之声”。关中地区亦饱受战火的蹂躏,更兼民族矛盾激化,灾害频繁,致使人口急剧下降。到东汉顺帝永和5年(公元140年)时,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剧降为415万人,在不到140年的时间里,人口净减少700多万,可见降幅之大(见表1—2)。

由表1—2可知,黄土高原的西北各郡人口下降之快达到惊人的程度,与西汉元始2年(公元2年)相比,朔方人口减少159万人,减少了95%;凉州人口减少77万,减少了78%;整个黄土高原人口下降了63个百分点。这一萧条状况直到三国期间始终没有多大好转,形成本区人口发展的一个低谷。与此同时,北方流民亦大量南迁,带去了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尤其是牛耕和铁制农具的推广,这无疑有利于江南经济的开发,也同时促使我国人口分布经

①表1—1资料见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甲表3(p14)。

历了一次突变，呈南增北减之势。

表1-2 东汉黄土高原地区各郡国人口数量增减之比较^①

州郡国	西汉人口	东汉人口	减少口数	减少的%	西汉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东汉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司隶	6682602	3106161	-3576441	-54%	42.5	19.6
并州	1926876	742716	-1184160	-62%	11.8	5.41
朔方	1673450	80237	-1593213	-95%	9.1	0.42
凉州	1001838	223419	-778419	-78%	4.4	0.98
合计	11284766	4152533	-7132233	-63%	15.4	5.35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汉末期，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汉，被安置在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同汉人杂居。北匈奴在章帝建初8年（公元83年）亦有38000余人归汉，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及永和5年（公元140年），又有20余万北匈奴归汉。环境变了，其生活方式也跟着发生了变化。东汉时，同汉族为邻的各游牧民族和西北方的羌人和氏人，由于同大农业区的接触越来越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耕稼之明，因而与内地农民逐渐融合。

2.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概况。

这段长达4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动乱的时代。战乱迭起，反复破坏，经济萎缩，人口锐减，人口再生产在零增长以下起伏。但另一方面，人口大规模迁移，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人民广泛的相互影响，各民族的交汇融合较以往更为充分。

公元3世纪，中国进入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当曹魏势力于公元211年控制关中时，为了招还流入荆州的百姓，普遍推行“均田制”，奖励农桑，并取消两汉的田赋和算赋，起到了刺激经济和人口发展的作用。到元帝景元4年（公元263年），魏国人口居三国之首达443万^②。在魏蜀之间争城夺地的同时，曹魏曾多次将甘肃境内的汉、羌、氏、休屠胡等民族的大量人口强迫迁徙到关中、汉中各地，使陇东、河套等边区人口大减。但此后，即在公元220~385年间，青海海东区，陇东和河套一带，由于战乱较少触及，中原难民大量涌入，致使黄土高原的西北部的人口得以恢复。如永嘉乱时，“中州避乱者日月相继”，在内蒙古套涌入的晋人有“控弦之士四十余万”。塞北鲜卑人的很多部族也在魏晋时大量涌入海东和陇东地区，以“各农桑修邻好”，从事农业生产，与羌汉人民相处融合。公元439年，北魏拓跋氏势力开始进入这一地区。

早在东汉后期就迁入山西境内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乘“八王之乱”纷纷起兵。后匈奴酋长刘渊父子起兵，推翻了西晋的统治，从而开始了100多年的战乱时期，史称“五胡乱华”。关中和山西是战火激烈地区，人民流离失所，白骨横野，迫使10万人流亡，人口遭到巨大损耗。昔日繁华的西京如今是“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公元352年，氏人苻坚称帝，徙其族4万余户于长安，着力恢复关中的农业和人口。但淝水之战，秦兵惨败，死者十之七、八，使苻坚在位20多年增殖的人口遭到巨大损耗。直到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公元516~530年），迁都平城后，社会、经济和人口才得以恢复和发展。这时期本地区人口史籍记载不详，估计比晋康年间（公元280年）的309万^③有所增

^{①②}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甲表9、甲表13。

^③东汉时把朔方归并州，为了便于比较，特分开。

^④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5。

加。北魏统治者还将其他各州的居民，大规模迁徙于平城附近，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因而加强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魏文帝时，实行的均田制，将荒田授予无地农民，保证休耕制的实施，加之桑田可以私有，这对于恢复因长期战乱而遭受破坏的经济、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蜚声遐迩，气势宏大的大同云岗石窟、甘肃的敦煌、麦积山和炳灵寺等石窟艺术，就是这个时期开凿的。

在此期间，北方匈奴、鲜卑、氐、羌、羯、胡等许多游牧民族迁入黄河流域并与当地居民交汇融合之时，北方人口也大量地南移，尤其是公元319年晋室迁移到建康时，大量汉族居民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以南，并把北方较为先进的生产力予以推广。这些较大的移民活动，不仅加速了各民族人民的融汇过程，而且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当时，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地区几乎发展成为比较重要的农耕区，大大改变了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或“水耕而水耨”的景观。而在北方，迁入黄河流域的各游牧民族一般不重视农业生产，故种植业的发展基本上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这是本地区开始失去政治经济优势的开始。

归结起来，从东汉到南北朝，由于战乱连绵不断，中原为混战的主要地带，因而这里的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人口大量散亡，使人口增长一直很缓慢。西晋太康初年（公元280年）本地区人口仅为309万^①人，成为本地区封建社会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低谷。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形成了黄土高原又一次各民族的大融合，大迁徙的局面。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人口迁移，它对以后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3. 隋唐时期黄土高原地区人口状况。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生产力发展到前所未见的高水平。与之相应，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人口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公元589年，隋灭陈后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270余年的分裂割据状况。接着，隋王朝又重新推行均田制，减轻赋役，改革官制，废除苛法，打击豪强，缓和了阶级矛盾，减轻了人民负担，这就促进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到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已达1195万人^②，又恢复了西汉时的水平。但从280年到609年这300多年里，人口剧增886万，究其原因：第一，北魏以来本地区西北部的人口是在基本无损耗的情况下进入隋代的，这是隋代黄土高原人口发展的基础。第二，隋王朝为了增加中央的赋税收入，大力整顿赋役和户籍。采取“大索貌阅”的办法，即清查户口、查看容貌，以见老小之实，规定堂兄弟之属以下均须分别立户，防止隐匿，并索取被豪强隐没的户口。大索的结果，增丁44.3万人，新户口164.2万人。第三，改革府兵制。下诏“凡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与民同”。使一向列于户口统计之外的军人及随从家属，纳入民籍统计户口。这样，使甘肃、青海、宁夏等边境地区人口统计较接近于实际。第四，部分少数民族的内附，如吐谷浑仙头王“率男女十余万来降”^③。所有这些，使隋代的人口恢复到了西汉的人口峰值。

唐初，统治者继续推行有利于增加户口和加速人口繁殖的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由于可以“输庸代役”，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生产。其次，劝勉

^①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赋、田赋统计》甲表15。

^②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赋、田赋统计》甲表22。

^③见《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国民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章。

民间嫁娶，提高生育率。如贞观年间，即颁诏规定：女子15岁以前应出嫁，对生育子女多的人给予奖励；同时还把户口的升降作为考核地方官的标准，“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递，如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①。再次，采用号召和赎买的办法把被外国（族）虏去的人们招致归来，并尽量吸收外国人口。据《新唐书·突厥传》记载，仅贞观4年（公元630年），唐朝用金币从突厥赎回的人口数达8万之多。最后，唐王朝还建立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与措施，有利于人口的增殖。唐从开国到天宝130多年，社会经济从恢复到繁荣，国势臻于鼎盛。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黄土高原区的人口达到1015万人^②（见表1—3）。这个统计数字是在开元、天宝“兼并之弊有愈于汉成、哀之间”^③、“天下之人，流散非一”^④等情况下进行的，显然不是唐代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最多的时期，也大大小于当时黄土高原地区的实有人口数。

从表1—3人口分布中可以看出：

（1）黄土高原地区东西部人口分布开始出现明显差异。

（2）关中地区人口在多次浩劫之后，到此时已明显得到恢复和发展。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府人口高达196万^⑤，洛阳人口高达140万^⑥，远远超过其它各郡府。这主要是因为唐定都长安，使这一地区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交通中心，又是闻名世界的“丝

表1—3 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黄土高原地区的各道人口数

道 别	户 数	口 数	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
京 道	538199	3098219	46.4
关内道	271770	1503467	3.5
河东道	630512	3723217	23.2
陇右道	48011	226651	0.7
河南道	330647	1810056	38.2
合 计	1280919	10157624	

绸之路”的起点，使得王朝的贵族官僚、将兵、官私的奴婢、文人学士及艺人，各国和各少数民族使臣，各地和各民族的商贾、寺院、道观的僧尼、道士等大量云集于此，呈现出一派盛唐繁荣景象。关中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场所之一。

唐朝高度发展的封建物质文明亦不断吸引少数民族入塞，黄土高原北部的鄂尔多斯地区成为他们集中的聚居区。贞观四年，唐太宗将10余万投降的突厥人安置在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地区。高宗麟德年间，浑和斛纛万余帐移入河套，由于牧地膏腴，水草不乏，故部落日富。随后，又有“万余帐”的后突厥和五万多的杂胡移入这一地区。党项拓跋在吐蕃威逼下，随唐后也迁入这一地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多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的重点。于是，敕勒族所属的回纥、拔野古、回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等11部共遣千人入贡。贞观二十年九月，唐太宗到灵州会见他们，并赋诗立碑，这是西北众多部族共同拥戴中

①见《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章。

②③④见黎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6、甲表28。

⑤《通典·田制下》。

⑥《唐会要·逃户》。

原政权的空前盛会。到天宝初年（公元742年），鄂尔多斯地区已有户18896，人口9.6万^①，结束了自王莽篡权以来河套地区人口波动不前的景况。

唐初，吐蕃进入青海，逐渐统一了诸羌部落，控制了原吐谷浑辖地。当时，唐王朝先曾与吐蕃在西平以西二三百里地带逐角，后不仅改变策略，放弃了“贵中华、贱夷狄”政策，并实行了唐蕃和亲的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河湟各地有9650户，人口达5.1万人^②，比隋代有明显增加。

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省，原是唐王朝的肇基之地，李渊被隋王朝封为唐公，他与其子李世民把山西作为立业兴帮的基地。李家父子在山西置屯田、劝农桑、兴水利，曾大兴水利工程35处，居当时全国第三位。贞观4年，并州大稔、斗粟三钱，流散者咸归故里，一片岁丰民安的景象。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山西人口增到379万人^③，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25.04人，大于全国平均的人口密度。人口多分布于晋中盆地并呈现山南向北递减之势，为唐代人口密集、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的好地方。

总之，黄土高原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在隋唐时期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各民族的融合较以前更广泛、更充分。

天宝年间，爆发了持续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这次战乱使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又一次遭到惨重损失。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7~819）与天宝年间相比，京兆府的总户数比战前减少1/3^④；位于目前陕西省中部和甘肃东部的十几个州，户数合计仅为战乱前的1/4^⑤；山西境内破坏稍轻，总户数亦减少2/3^⑥。自此之后，黄土高原的黄河流域就不再是全国人口分布的重心。

经“安史之乱”的打击，唐朝从此一蹶不振，虽然还维持了一百多年，但宦官擅权，朋党相争，朝政十分腐败，封建割据势力于各地自立，蹂躏百姓。如发生于公元855年的秦宗权叛乱，占居长安一个多月，“焚烧宫阙、粟剥居民”，使若大京城“鞠为灰烬，寂无鸡犬之声”。^⑦造成“民无耕织，千室之邑，不存一二”^⑧的惨状。尤其是那些被吐蕃统治的唐人子孙，被视为非族类，“无贤愚，悉为奴仆，或“丛属于城落之间，或散处于野泽之中”^⑨，使得黄土高原的人口大为减少。唐亡后的五代十国，又是军阀大混战的黑暗历史时期。北方五个小朝廷以洛阳或开封为都，他们拼命掠刮百姓，迭相倾覆，争战不息。关中一带尸横遍野，千里之内，焚剽殆尽，正是“五代乱世，本无刑章，视人命为草芥，动以族事”^⑩；人口大减，社会权度动乱，经济呈现萎缩状态，只有党项在宁夏建立的夏国的经济有一定发展。

（四）宋元明清时期的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发展状况

这一阶段经历了五个朝代880年，分为宋元（公元960~1368年），明清（公元1368~1840年）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急剧增长，至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人口突破4亿，奠定了近代中国的人口规模，成为旧中国人口发展对当代人口影响最大的时期。与之相

① 《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三期。

②③ 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赋、田赋统计》甲表26。

④⑤⑥ 见《中国人口-陕西分册，甘肃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二章。

⑦ 《旧五代史·梁书·李罕之传》。

⑧ 《旧唐书·昭宗本纪》。

⑨ 见《沈下贤文集》。

⑩ 《二十回史书记》卷22。

应，黄土高原的历史人口也发展到了它的高峰期。

1. 宋元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状况。

自“安史之乱”起，我国的经济和人口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停滞和倒退，直到宋朝建立，才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

但是，宋的统一并没有完全解决黄土高原地区的混战局面。在唐以后发展起来的西夏占据着宁夏、内蒙、甘肃等大部分地区。在宋、西夏对峙期间，双方在宁夏南部至陕北一线上，集结了大量军队，仅宋的禁军就达20余万。交战中，各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此外，还有和辽的战事，也损失不少人口。并且契丹人还不断地迁往山西、泰州、河东等地，使原居民户被迫迁居他乡。特别是女真族的金崛起灭辽之后，成为北宋的最大威胁。北宋在对金战争中总是失败，靠输纳财货和割地求和，致使黄土高原人民负担着沉重的军役和战费。加之灾疫肆虐，百姓疾苦更深，相继败亡。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进取陕西，宋、金在陕北、关中激战了3年，陕北、延安、户县、坊州“皆残破，人民存者无几”^①。关中百姓死亡之余，大量流入蜀汉和东南。与此同时，东南及四川地区的人口在大量增加，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跃为6.6%^②，远超过北方人口所占的比重。

北宋有多次人口统计，大多不能反映黄土高原地区历史人口的全貌，只有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的数字稍能代表。除宁夏北部等西夏占据地区外，本地区有户211.8万，人口650.3万，户均3.017，户口占全国户数的10.5%，人口占14.3%^③。与过去相比，宋代户口统计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户均人口减少，户与口显得极不成比例。这就是因为宋代户口有“主户”和“客户”之分，有土地的是“主户”，包括地主和自耕农，没有土地的是“客户”，以佃农为多。主户需要纳税，客户不需要直接向政府纳税，客户依附于主户，受主户剥削，这无疑为人口的隐瞒开了个大口子。再有，北宋的徭役赋税极为繁重，而且按丁计，迫使许多农民甚至到了“而立”之年，还冒充儿童以此逃避役赋负担。

在宋、金对峙中，由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军日益强大。公元1234年，蒙军主力大举灭金，又经过长达40余年的战争，灭南宋，以中部（北京）为大都，建立元朝。元的建立，结束了各族政权并立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建立起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基本上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各族人民迁徙与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相互间多方面的联系增强。但是，国家的统一，并未改善人口再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反而使之恶化。这是因为元从建国之初，就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把全体居民分成若干等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各地人民的反抗和起义几乎从未间断，政权内部也很不稳定，武装叛乱和派系争斗差不多贯穿始终。在经济上，由于蒙古族长期过着奴隶制的游牧生活，平定中原后，统治者虽也提倡农耕，但他们那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的发展还是起了很大的干扰和阻碍作用，而且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富户侵占良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的现象十分普遍。至于各种徭役差役，随时任意征发，加上灾荒频繁，使广大农民处境非常艰难，户口趋于减少。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9所载元代黄土高原的户口为37.4万户，160.6万人。当然不能说元黄土高原地区人口下降到如此程度。因为元代官方户籍记载不全，只记民户，不记军户、

①《金史·娄室传》。

②《中国人口-河南分册》。

③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8。

站户、匠户和驱奴，而且其时北方人口亦大量南迁，户口减少，北方尤甚，是元朝历时百年的总状况。

元代还有一个特别要提及的现象，那就是黄土高原回民的形成。在蒙古军征服中原的过程中，从中亚和西亚征调了大批各族人民（多为伊斯兰教徒）组成了“西域”亲军。战争结束后，其中主力之一的“回回军”分驻各地从事镇守和屯田，尤其是以宁夏和甘、清的河湟地区为最多，成为色目人的一部分。他们同北宋、西夏时期的当地回回“先民”一起，逐渐繁衍发展，形成了本地区重要民族之一的回族。回族的迁移和形成，尤对甘、宁、青等地区的经济、人口和宗教发挥了巨大作用，对后世的社会经济生活内容也留下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如今，仍有197.5万回民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的各个地区。

2. 明代至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的黄土高原人口状况。

元朝后期，社会危机四伏，各种矛盾尖锐，导致红巾军大起义。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贵族退到北方。随之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明、蒙之间在宁夏北部，甘肃、内蒙等地进行了无休止的战争，致使这一地区经济遭到破坏，人口稀少，到处一片荒凉。面对此景，出身贫寒的朱元璋，从切身体会中深知，必须发展经济，使农民安心生产，才能“长治久安”。因而他大力组织屯田，鼓励垦荒，招集流亡，同时减轻农民负担，使得经济和人口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达到所谓“百姓充实，府藏衍溢”^①的局面。与此同时，黄土高原的中原和山西地区的人口也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以山西省（此时内蒙河套已编入该省）为例，明初洪武26年（公元1393年）山西有人口407万，平均密度为27.81人/平方公里；到弘治4年（公元1491年）增至436万，平均每平方公里27.77人；到万历6年（公元1578年），人口增至532万，平均每平方公里36.32人^②，为当时北方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由于山西人口很稠密，明初即有大规模移民之举。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曾迁山西中部、西部、东部民“以实北平（河北）”^③。

明朝统治者为了征发赋役，推行黄册制度，即登记各地人户，登记的项目有：户的种类如居户、匠户等，户主的原籍和现在籍贯，居住所在地，家中男女、老幼的姓名、年龄和人数，他们和户主的亲属关系等。“户贴”的格式和调查项目由中央户部统一规定，户贴由户部印刷，发到各州、县，必须派员按户调查，并以严刑立法来确保对户口的控制。明代为后人留下了较详细的人口调查数据，也可以说是现代人口普查的先驱。但由于逃亡、隐匿以及地主豪强对户口的隐瞒，造成了明代官方户口统计的严重失真，致使进行历史对比失去了可靠的依据。为了使人口数可能比原来的官方统计更接近于真实一些，胡焕庸先生等拟了一个分区修正系数^④，即全国总人口比官方统计数扩大了一倍，其中河南，陕西扩大半倍，山西扩大一倍。按这个修正数，来计算明天顺初年及嘉靖、隆庆年间的黄土高原的人口数。明官方统计的黄土高原地区的户数是86.7万户，按修正数扩大后，本地区的户数是153.7万户，按每户平均口数9.86计，本地区人人口数约为1515.6万，见表1—4。

“移民实边”和“屯垦”是明代重要的农业政策。洪武初，河湟地区、平凉、宁夏等地

①《中国古代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一版。

②樊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72。

③《山西省情》山西人民出版社。

④见胡焕庸等编的《中国人口地理》第三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就开始了民屯垦荒。此后，又扩展黄土高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如洪武8年（公元1370年），“置贵德所（青海的黄土高原）上，置马军五百，卫守此土，屯兵五百，以供刍粮”^①。洪武9年，“设宁夏卫，迁五万之人实之”^②。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西北边防能否巩固的关键。与此同时，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明代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汉、回之间对流式的迁移。关中、山西、青海的回民大多是这时迁入的，明代亦是回民在黄土高原的稳步发展时期。在宁夏、甘肃省的庆阳、临兆等地，所谓回之踪迹“已无处无之”。宁夏至

表1-4 明天顺初年及嘉靖、隆庆年间(公元1457~1571年)黄土高原人口分布^③

省 别	户 数	修正户数	按平均口数9.86计 ^④
山西布政使司(包河套)	474650	949300	9360098
陕西布政使司(包、甘、宁、青)	262130	393195	3876902
河南布政使司	129800	194700	1919742
合 计	866580	1537195	15150742

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⑤。明代的屯垦和移民实边政策，对黄土高原的社会经济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是对元代黄土高原残破经济的恢复，同时也为清代本地区开发和人口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明代中期以后，宦官跋扈，竞争迭起，社会矛盾激化。其时，地主阶级已把全国绝大多数的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自耕农几乎凋零殆尽。在此情况下，又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从万历47年到崇祯12年（公元1619~1639年），水旱蝗霍诸多灾害更是连绵不断，尤其是黄河流域的河患更甚，加之又经明末清初的多年恶战，使本地区人口遭到极大损失。如陇东的庆阳县，在万历6年（公元1578年）有2.9万人，清顺治18年（公元1661年）仅为3900人，净减2.5万人。山西省由万历6年的532万人减少到清顺治18年的153万人，净减379万人^⑥。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经济的凋敝和人口稀少的局面，清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吸取历史经验，实行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1) 清将明藩王集团最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原来的佃户，归他们所有，新开垦的荒地每户给牛一头，农具一付。

(2) 整顿赋役制度。为减少以丁征赋所造成的逃亡，康熙51年（公元1712年）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50年全国丁银数为足额，以后增加人丁，不再加赋。这缓和了土地关系，减轻了赋税负担。到雍正2年（公元1724年），又进一步实行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地丁制度，把以往固定下来的丁银全部摊入田赋中。我国历史上施行了数千年之久的人头税，至此基本上被废除了，解除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以及在增殖人口方面的主要障碍，并削弱了封建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束缚。

(3) 清代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发展，这里主要指资本主义手工业，特别是技术科学的发展。康熙、乾隆年间，采矿、冶炼、纺织、陶瓷和制盐等手工业，都有了较

①见《青海省情》青海人民出版社。

②见《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p43。

③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173。

④同上甲表72，9，86系上面三个布政司的平均口数。

⑤《甘肃省情》甘肃人民出版社。

⑥上面一系列数据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甲表72和甲表80。

快发展，技术分工也较细密。如本地区山西省潞州、泽州等地“共有织机一万三千余张”，所产潞绸驰誉中外。潞安荫城一带的铁货交易，年平均就达一千余万两白银^①。在陕北和关中，到处可见因开采煤矿聚集于此的众多人口。陇西，兰州及西宁附近的铁矿开采在全国也占重要地位。与之相应，商业也十分活跃^②。如山西“泽潞豪商大富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③，由于商业的发展，还在山西产生了专门商业金融组织——钱庄和票号^④。当时甘肃的兰州商品市场、西宁丹噶尔的甘青民族贸易市场以及河套地区的汉蒙贸易市场，在康熙年间都很繁荣且有名^⑤。所有这一切，使就业增多，势必更加刺激经济和人口的增长。

(4)中央和地方大力兴办农田水利业，并奖励垦荒，原有田地得以治理，可耕地得以开垦，人口也随之不断增加。例如山西境内在此时期修复和新建的农田水利工程达9~7处，在甘肃，以水磨为主的水力资源开发利用，在全国都有明显的领先地位。在宁夏则兴建了惠农、昌润、大清诸渠，河套的灌渠如网，号称塞上江南。在青海的西宁一县有渠316条，灌水地29万余亩，海东地区的农业区在此时正式确立^⑥。

(5)“移民实边”、“屯垦”是清政府繁庶丁口和安置流民最重要的措施。清政府除在河湟、河套、陇东等地鼓励农民或流亡之民大量开垦外，还积极进行军垦。顺治初，改甘肃卫军为屯丁，后又改凉州“戎军为屯丁”。这不仅减少了当地人民的负担，而且增强了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社会安定，经济的发展，大大加强了黄土高原地区的稳定性和安全感，这无疑为人口增殖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6)清代非常重视户籍管理，使官府的户籍数字也随之接近实际。清政府规定各省诸邑人户由当地长官每年十月造册，于次年八月咨送户部。特别是满、蒙、汉的丁档，则由户部的八旗俸饷处管理，每年年终，户部必须把民数汇总填写黄册上报。清代的户籍分为四种，即民籍、军籍、商籍和大士籍，它体现了社会人口行业构成。此外，还区别分为回、番、羌和夷等户，户籍还明确规定：社会阶级身份不能含糊，职业不能混同。嘉庆年间，还对各地游民注册安置。在人口统计上，清初的近一个世纪中，官方只有人丁统计，从乾隆6年（公元1741年）起转用“大小量妇”计数，使大批逃户入籍，从而开始了较为明确的人口统计。因而清代记有较为详实的户口统计，为人口研究提供了有效的资料。

(7)除了历史上传统的传宗接代的需要、妇女早婚多育等原因之外，还有医药卫生方面的改善。嘉庆8年（公元1803）西洋种痘法由西班牙传入中国，减少了天花传染病，这也有

表1-5

清嘉庆25年(公元1820年)黄土高原地区各府州人口数^⑦

府 州	人 口
山西统部	14597428
河南统部	5676478
陕西统部	9681962
甘肃统部	10359416
合 计	29955868

助于减少人口死亡率，使人口净增长数量大大提高。

①②③见《山西省情》山西人民出版社。

④⑤见《甘肃省情》甘肃人民出版社。

⑥《青海省情》青海人民出版社。

⑦见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所有这一切，使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发展，不仅从明末清初的低谷中得到恢复，而且逐步达到有记载的黄土高原地区古代人口数值的最高峰。到清嘉庆25年（公元1820年），本地区有2995.6万人，这是黄土高原地区历史人口数值的第二个高峰，不仅突破了2000万大关，而且迈向3000万大关。但从另一个方面讲，由于人口的高速增长，在许多地区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人多地少的矛盾。如山西省在明嘉靖21年（公元1542年）有506.9万人，地3915.7亩，平均每人有地7.7亩；到清嘉庆25年（公元1820年），山西省人口达1462.7万人，地5255.1亩，田地在这200多年间增加了1339.4亩，而人均有地却降为3.6亩，下降近1半。这种人口的压力，显然加剧了社会危机，大有人满为患之势。整个社会经济沉重地感到人口过多的压力，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人多地少降低了小农经济对劳动力增加的需求，那些被土地排挤出来的大量农民无处安生，生活困难，造成黄河流域“多余”的劳动力转向满族地区去谋生，过着流亡动盪的生活。所有这一切最终又影响到人口再生产速度、规模和质量。这种现象恰好反映了人口与经济相互制约的辩证规律。清初，人口过少，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清政府即大力鼓励人口增殖，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清中、后期，人口超过一定限度，更多的人口非但没有进一步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因消费量扩大对经济起了抑制作用。从清代中期起，直到解放前夕，人口过多，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大痼疾，亦是黄土高原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一个沉重包袱。人口压力是长期作用于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的一个重要消极因素，时至今日，人口过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人口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的突出问题。

二 近代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人口状况

1840年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把中国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共同压榨中国人民，苛政加天灾瘟疫，使人民大量死亡。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从1840年到解放前为止，本地区人口数量的发展起伏曲折，几经大幅度急剧下降，长期处于恢复性的发展状态之中。这段历史延续了109年，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界，分为清代晚期和中华民国两个时期。这一百多年的人口、民族分布及主要特点，对黄土高原现代人口影响较之古代的人口分布要大得多。

（一）清代晚期的黄土高原地区人口状况（1840~1911年）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总量从康熙时起持续上升，至道光20年（公元1840年），人口增至4100.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9.7%^①，这是近代本地区人口总量变动的起点也是清代以至中华民国在籍人口数的最高峰值。自此，本地区人口数便呈现出长期停滞的状态，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

清代中、后期，清朝的封建统治已经走向反面，各地官员强征苛派日益严重，同时土地兼并加剧，一度实行过的“轻徭薄赋”也完全改变了。广大农民除承受高达50~80%的地租外，还要交纳额外的田赋和种种苛捐杂税，沉重的赋税和差役，把越来越多的贫民驱向赤贫和破产，他们终年勤劳，所得粮食除交完田主租息外，余存仅堪糊口。亦有大批农民“致活

^① 参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2。先计算出山西的年平均增长率，以此可作为河南黄土高原1820~184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以1820年为基数，算出河南黄土高原的1840年的人口数。再用陕西（除汉中商州等地）的年平均增长率，作为甘肃、青海、宁夏的黄土高原地区的1820~184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以1820年为基数，算出它们1840年的人口数，就得出1840年的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数。

户亦逃，熟地亦荒，民难生聚”^①。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纷纷入侵，由于黄土高原地区僻处内地，交通不便，少受其害，但同样也遭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严重摧残。主要祸害首先是侵略者用以打开中国大门的毒品鸦片。据现有史料，1840年前后鸦片就流入了陕西等黄土高原的许多省份，不但官吏兵丁十有八九沉溺其中，就是城乡男女，也因此废业，并造成银与钱的比价急剧上升，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租税负担成倍加重的后果。政府当局和地主阶级从扩大罌粟田和炼制土鸦片获取巨大的利益，各项税收由此大增，地租加重，为此被占的耕地极广。同时，以棉布为中心的“洋货”工业品充斥于陕西、河南、山西和甘肃等省的大部分地区，挤占了传统手工业品市场，严重阻碍和摧残了黄土高原的农业和手工业，致使小农经济滑入半破产境地，使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了生路。加之中国北方连续几年发生大旱，民不聊生，出现“人相食”的惨象。人民走投无路，便挺而走险，举行暴动，又遭清政府残酷的军事镇压和屠杀。凡此种种，使近百年来人口相对过剩的社会问题更加尖锐，高出生和高死亡相拌而行。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了支付帝国主义索取的巨大赔款，采取了抽收厘金，增收盐税和亩捐，增发通货来搜刮民众。而且清政府一贯采取反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挑拨政策，又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受太平军和捻军革命的影响，在黄土高原的陕、甘、青等地区，爆发了以回民为主体，各民族人民都参加的“同治回乱”，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清武装斗争。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回、汉人民死伤无数，大量散亡，使得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惨遭浩劫而猛跌。其时情况之惨重，连左宗棠也认为“变乱以来，汉回人民，死亡大半，牧畜鲜存”^②。回民更是伤亡惨重，三分得去其二，回民的地理分布受到极大的影响。到1874年，黄土高原的人口仅剩2114万人^③，形成了本地区近代历史人口数量发展的最大低谷，自此以后，本地区人口则处于恢复性的发展状态之中。

从1870年，为挽救战乱造成的破败局面，清政府对西北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的政策。如奖励垦荒，劝民畜牧，广招流亡协助归农，迁徙安置回、汉人民，并举办各种实业。如1872年创办了兰州制造局，1877~1880年创办了甘肃织呢总局。1892年创办了太原火柴局。1898年创办了太原机器局和山西通省工艺局。这对后来的工业发展都直接或间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措施和政策，使本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山西为最快，加之与祖国东部战乱局面相比，本地区相对稳定，这就为人口增殖和吸引外来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到1921年，本地区人口已恢复到2736.5万人^④，占全国总人口的7.6%。

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省，一直是人口分布的稠密地区。清末已处于停滞阶段，只是靠着前期人口高速增长的巨大惯性，加之地处内地，所以在1840~1877年才得以保持一个很低的发展速度。1840年山西人口为1489.2万，1877年为1643万人^⑤，但从1877年以后，山西人口锐减。1878年山西人口就降为1555.17万，比1877年减少87.3万人，到1887年跌至1106.58万人，10年内人口减少了1/3。1887年到1898年的10余年中人口仅维持在1100万左右^⑥。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当然与政府的腐败、沉重的赋税、帝国主义的经济摧残和天灾有关。但还有

①《甘肃全省新通志》卷17。

②《中国人口—陕西分册》第65页。

③由于山西、河套等黄土高原地区受战乱影响较小，人口散亡不大。所以先根据甘肃1874年的年平均递减率，算出陕西、宁夏等地区的1874年人口数，再加上山西、河套、河南等黄土高原人口数，则得出2144万人。

④见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86。

⑤⑥《山西省情》。

一个因素不容忽视，而且这个因素对整个黄土高原地区都是很重要的一点。即黄土高原的自然生态系统在长期人口压力下日趋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则愈演愈烈，使农业生产一再受到严重损失。由于人口的激增，许多地方为开辟耕地，不惜纵火焚山，森林草地的破坏使水文和气候条件明显趋于恶化，干旱加剧，原先比较完整的黄土高原表面，也逐渐变成千沟万壑，以至于整个黄土高原的经济和人口发展均深受其不利影响。

与历代相比，清代有一个显著特点，即流民的存在是种社会常态。在乾隆以前，流民产生的社会原因仍是由于战乱和灾荒造成，昔日流民“舍业而嬉，故可驱而返之”或“资送回籍”或“安插复业”。而在清后期，由于人口的激增，土地资源的有限，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大多数农民必须外出佣工或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职业，而当时整个社会又没有新的生产部门容纳这些被抛出土地的生产者，结果便产生了大批过剩劳动力，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流民阶层。由于流民主要意在追求生活资料，流动的方向则是自东而西，自南而北，由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向人口密度小的地区流动，由已开发地区向开发中地区或未开发地区流动。黄土高原那些处于开发中的广大地区尤其是西北部地区，人口密度相对还小，战乱较少，因而容纳了大批流民。以内蒙河套为例，原居河套的蒙古族由于崇信喇嘛教，加之政府的大量征兵，生产、生活无保证，因而内蒙古人口一直处于停滞和萎缩之中。乾隆年间，河套中的汉、蒙族人口数为23.5万^①。由于流民的大量涌入和繁殖，到1911年内蒙河套的人口数高达85.8万人^②。并且这种流民涌入的势头在民国时期有增无减。如平凉县志所云：“休养迄清末，为户2800有奇，今增至15342户，丁口殆且十万，生殖之速一何如此？改革之后，中原多故，陇上数十百城，浮寄孤悬，频躏于匪不能自保，而且以地当要会……故邻封之民流寓于此以避难，丁口故之顿增”^③。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初年，将以前的满营三年换防制度改为固定驻防，都在边防永久定居。这样，本地区又增添了长期定居的少数民族——满族。可惜，清中期以前政府对满族的活动控制很严，所以当时他们没有同其它民族广泛交往的机会。

（二）民国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状况

辛亥革命以后，腐朽的满清皇朝虽然被推翻了，但中国又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之中，社会的混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自十九世纪后期起，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渗透，它们全面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1945年间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农村经济进一步趋于瓦解，但封建地主剥削制度继续保持，并与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居明显的优势，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前后38年间，4亿中国人民呻吟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人口再生产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下。

在前16年即1911~1928年间，由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加之不久欧战爆发，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华侵略，民族资本有所发展。此外，黄土高原地区与东部混乱相比相对稳定。于是，各种人士和难民便循着历史上的老路，来到西北地区，使丁口顿增。辛亥革命倡导“五族共和”，虽

^{①②}《中国人口—内蒙分册》。

^③《中国人口—甘肃分册》。

事实上没很好实行，但却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了各民族的平等地位，使民族矛盾相对缓和。加上手工业和交通事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这都为黄土高原人口增殖和外地人迁入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同时期的本地区广大农村，由于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仍发生作用，农村又较远离政治动乱和战争影响，保持着较高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因而民国初期黄土高原人口处于低速发展之中。宁夏在1909年有户9.2万户，人口50.4万人，到1928年则有户12.0万户，人口66.8万人^①。青海海东区在1909年有36.7万人，到1928年则有42.9万人^②。据粗略计算，1928年，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数约为3132.9万人^③。应该指出，这一时期，陕、甘、宁等地区多次遭地震、旱灾袭击，人口下降，由于迁移性增长较快和哈萨克族的相继迁入，因而1928年人口数才会达到此数。

在后18年，战争连绵不断，先是一系列的军阀混乱，以及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和许多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剿”，最后是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这些战乱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伤亡。在此期间，由于国民党实行反共、卖国、独裁的政策，对经济建设不闻不问，加之天灾接踵而至，使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严重。如民国19年（1930年），甘、山两省大旱，居民初则食树皮，继则卖儿卖女，后又吃死尸，易食生人，迫使广大群众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尽管出生率很高，但自然增长率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而且人口质量也十分低劣，广大人民体质差，疾病多，被洋人视为“东亚病夫”，新生儿平均期望寿命仅34岁，1/5到2/5的婴儿活不过周岁，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极端落后。仅宁夏一省在民国时期，文盲占人口总数的95%以上。在这种环境下，罪恶滋生，吸毒、卖淫、赌博等陋习成风，可谓“人皆面黄肌瘦，蓬头长发，几不似人类”。

抗日战争时期，除山西直接遭到日军的铁蹄之外，黄土高原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南、华中大部分国土沦陷地的许多机关、团体、学校等纷纷内迁，大量难民也随之西流，因而本地区人口由于迁入增加，加之自然增殖而增长较快。抗战胜利后，难民大量返回原籍，就必然使本地区人口由于迁出而减少。如兰州市，1944年有17万人，1945年则为15.5万人，下降1.4万人，减少8.6%^④，若把陕、甘、青、宁、内蒙等省加在一起，迁出的人口也是不小的数字。

尤要提到的是，在共产党、八路军开辟的陕、甘、宁、晋绥、太行和太岳的各解放区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深入开展了减租减息、农业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各解放区的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广大农村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明显地使农村生产关系朝着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方向发展，解放了生产力，政府对农业生产积极扶持的同时，还采取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的政策，使边区工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此外，边区人民还积极参加卫生运动，消除迷信和不卫生习惯，并且边区还普及教育，消除文盲。这一切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生产，改善了军民生活，为提高人口素质和人口增殖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边区人口的迁入增长也很快，一是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红军、八路军进驻边区。二是抗战爆发后，革命爱国者从国统区、日占区及海外各地涌入边区，三是难民的移入，使边区人口

①《中国人口—宁夏分册》。

②《中国人口—青海分册》。

③《中国人口—宁夏分册》、《中国人口—青海分册》，从中算出1903~192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以1912年本区人口为基数，则可得3132.9万人。

④《中国人口—甘肃分册》。